

# 聊赠一枝春

□雷雨

某年春,因为《长城志》,与几位同事曾到大同、张家口。去了大同的得胜堡,一路盘旋,路途迢迢,颇有边塞的风致。也去了张北县的鸡鸣驿,还去了蔚县,看辽代的壁画,真是大开眼界。实际上,还想去涿鹿县?为何要去涿鹿?是为了看当年的涿鹿大战旧址?黄帝、炎帝,蚩尤当年在此处是否留下什么痕迹?这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,实际上,从张家口到大同,这条线路,大抵算是所谓幽云十六州的一条线,幽州也曾管辖张家口,云州就是大同,北魏时期的平城也大致在大同范围之内。而当年往返于这条官道之上的祖孙两人,与我一直留心的一位人物有点关联。我留心的人物是谁?《后汉书》的作者范曄是也。张家口涿鹿的祖孙二人又是何许人也?陆倕与陆凯。在当年,南北分裂,音问难通,地处江南的范曄,为何会与这陆家祖孙扯上关系?这还要从一首非常著名的五言诗说起。

折梅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这首五言诗,非常有名。一直的说法,是陆凯赠送给范曄的。范曄,多人知道是南朝人物,《后汉书》的作者,家族背景显赫,但他在445年被诛杀,得年47岁。给他赠诗的陆凯又是谁呢?众所周知,东吴陆家,自陆逊开始,一直门第鼎盛,地位显赫,陆抗、陆机、陆云,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陆凯是陆抗的孙子,但他出生在198年,比范曄早200年,这个陆凯,赠诗范曄,显然不大可能。

另有一陆凯,出生年月日期不详,病卒之年大致在504年。陆凯是陆倕之孙,据说是鲜卑族,字智君,北魏时期的代人,鲜卑族。代,就是当今张家口的涿鹿。陆凯出身名门,祖父陆倕曾官拜征西大将军,父兄也都为朝廷命官。他15岁时就官拜给事黄门侍郎,为皇帝亲近侍从。据称,陆凯忠厚诚挚,刚正不阿,身居要职数十年。后来,又出任正平太守七年,被称为良吏。

一直的说法是,陆凯与范曄友好,常以书信来往。当时南朝北朝处于对峙状态,但是陆凯与范曄暗地里不断通信,互相诉对时世的看法和感愤。陆凯于北魏景明二年,也就是501年,把一支梅花装在信袋里,暗暗捎给江南好友范曄。范曄拆开信一看,里面赫然放着一支梅花,并有诗一首,就是前面提到的这首五言诗。范曄被陆凯这首诗所感动,潸然泪下。这件事传出以后,被南北两方文人称赞不已。《荆川记》载:“陆凯与范曄交善,自江南寄梅花一枝,诣长安与曄,兼赠诗。”后人以“一枝春”作为梅花的代称,也常用作咏梅和别后相思的典故,并成为词牌名。需要注意的是,501年,北魏首都已经从平城,迁移到了洛阳。

陆凯的哥哥陆琇官拜司部典书,后来因为咸阳王元禧事件受到株连,冤死狱中。陆凯悲愤至极,不畏强暴势力,到处为哥哥申诉鸣冤。正始元年(504年),朝廷给陆琇平反昭雪,追复爵位。陆凯宿愿得偿,十分高兴,摆置酒席款待四方好友,席间表示自己心愿已遂,不再有所牵挂,大概在这一年也就去世了。问题来了,范曄是在445年被杀的,这首诗怎么会在范曄死后56年才寄出呢?即使在当时再信息阻隔,也不可能范曄被杀的噩耗要时过半个多世纪才传递到北方。陆凯的爷爷陆倕,出生在392年,大范曄6岁,死于458年,比范曄晚死13年,大致算是同辈人。《魏书》有陆倕传。陆倕之父陆突,在北魏朝担任过历威将军、离石镇将。北魏明元帝登基后,陆倕袭爵关内侯,任给事中,负责选部、兰台事务。兰台,多与文事有关。范曄又在醉心撰著《后汉书》,这样看来,莫非陆倕赠诗给范曄,较为靠谱?

再来看这首五言诗的如是翻译:遇见北去的驿使,就去折梅花,托他把手带给身在陇头的你。江南没有好东西可以表达我的情感,姑且送给你一枝报春的梅花以表春天的祝福。唐汝谔在《古诗解》中说道:“曄为江南人,陆凯代北人,当是范寄陆耳。”这里用《赠范曄》题,乃暂从旧说。这样说来,应该是范曄赠送给陆某的,而非陆某赠送给范曄的。

总结来看,这首诗的作者应该是范曄,范曄应该是写给陆凯的爷爷陆倕而非陆凯的。在古代,即使彼此对立,南北分裂,书信往来,彼此惺惺相惜的事例还是很多的。这首诗的著作权还是归属给范曄吧。

276

有一个新词,叫“伪雅”(有本书就译作《伪雅史》)。相对来说,哲学(形而上的)比历史(实证的)更容易“伪雅”,诗歌(片断的)比小说(叙事的)更容易“伪雅”。不过,哲学和诗歌都比不上美术,搞个男用小便池或电灯开关上展览,就算现代艺术了!

而比美术更容易“伪雅”的,恐怕要数电影了,只要让镜头一动不动,就大功告成(前有《帝国大厦》,后有蔡明亮)。

277

一般来说,研究学问,尤其是古代的学

问,题材多来自历史,来自书面,这就更需要研究者有一些人世的关怀,始能给其研究增加空间的维度,使历史问题变得有现场感和立体感;相对的,文学创作的题材则多来自现实,来自经验,这又需要创作者有一些书本的陶冶,始能给其创作增加时间的维度,使现实问题变得有历史感和纵深感。

278

戴望舒的《雨巷》:“撑着油纸伞,独自/彷徨在悠长、悠长/又寂寥的雨巷/我希望逢着/一个丁香一样地/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”

卞之琳的《断章》: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

##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二五



### 新书快递

#### 周作人集外文(1904—1945)

周作人著 陈子善、赵国忠编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新版《周作人集外文》共两卷,本书为上卷,收入1904年至1945年的集外文,包括散文、旧诗、新诗,以及为自己或他人的文章、译文所写的题记、附记、按语等未曾收入自编文集的作品。相较于之前版本,新版《周作人集外文1904—1945》历经六年搜集、整理与考订,收入近年来新发现的周作人佚文,增补170余篇(则),十万余字。就内容而言,早年的《小说丛话》系列、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《新文学的意义》和讨论“恋爱难题”的几通公开信等文,都值得格外留意。

#### 漫步神保町:日本旧书街通史

[日]鹿岛茂著 杜红译  
文化发展出版社

世界书业史上绝无仅有的旧书店街,鼎鼎大名的“神田神保町”是如何形成的?本书网罗了云集于此的书店、出版社、经销商、大学、语言学校、专门学校、预备校、电影院等一众业态不为人知的兴衰史,通过翔实的史料唤醒过往的缤纷记忆,勾勒出孕育了日本近代知识与文化的这一“奇异街区”之全貌。

#### 曾彦修访谈录

曾彦修口述 李晋西整理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老革命家、编辑出版家、杂文家曾彦修(笔名严秀)的最后口述实录,讲述这位九十岁老人生前波澜壮阔、跌宕起伏的一生,从四川宜宾故乡的童年往事,到延安的光辉岁月,到解放初期南粤之地的天地玄黄,再到北京政治漩涡里的波诡云谲。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,见证了一个讲真话的知识分子的际遇沉浮,也亲历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沧海桑田。全书质朴平实、语言凝练,兼具文学性和珍贵可靠的史料价值。

#### 将无同:中古史研究论文集

胡宝国  
中华书局

本书收录作者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共30篇。前19篇为专题论文,主要关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阶层、学术学风、地域文化、选官制度等,史料丰富,考辨细腻,且擅长从细节中提炼出宏观见解,在诸多重大论题上,深化了对魏晋南北朝政治、文化与社会认识。其余11篇则为学术书评与回忆文章等,眼光独到,文笔洗练,坦率真诚又充满谈谐。

# 反读书记

□胡文辉

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

郑愁予的《错误》:“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/我不是归人,是个过客……”

这三位诗人,当然写过不少作品,但其实都可谓孤篇成名,其盛名就来自这里的三首诗。这三首诗的共同点,是都刻画了一个有意境的片断,都带有深厚的古典意象和韵味,可以说,其得力处在于古典意境的现代化和白话化。

这样来看,席慕蓉的最大特色,我以为也正正在于“古典意境的现代化和白话化”,只是她的佳作要多得多,在实践上远远超越了戴、卞、郑三人。在“古典意境的现代化和白话化”方面,她是集大成者。

### 灯下读钱

## 烧日记(三)

□钱之俊

杨绛先生生前不承认自己写日记。曾有人当面问她有没有日记,她眯着眼睛,犹豫了一会,说:“我没有日记,不写。”(见拙文《杨绛:“蒋复璁不懂英文”》,《江海晚报》2019年6月13日)

但种种信息显示,她是记日记的,而且数量可观,内容丰富。杨绛说,她在牛津时“有些小小的‘歪学问’,常使锺书惊奇”,“一次锺书把我背的词和他刚读到的对比,一字不错,就在日记上说我想‘胜过’他呢。当然是胡说。我读了诗话、苏东坡‘众星烂如沸’句,被诗话作者打杠。我不服,锺书和我所见恰好一样。我读雪莱诗,有一句也是‘鸟鸣山更幽’的意思,他十分赞成,也记在日记上了。”(吴学昭《听杨绛谈往事》)和钱锺书一样,杨绛在牛津时记日记。

《听杨绛谈往事》还偶然写道:“杨绛翻阅旧日记,看到这年‘6月25日,我午后睡得一觉,锺书喜极而涕。’‘8月7日,午后睡着,锺书喜极,谢我。甚感其意。’”这是他们晚年的情形。杨先生出访,也很少寄信,而是用笔记下见闻,“记的是准备讲给锺书听的事,例如她看到的景物,听到的事情等等。”(《听杨绛谈往事》)她的日记,也是从青年写到老年的。

杨先生生前自撰《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》,越到后期越详细,这个详细的大事记,据言就是对照自己日记写的。洋洋洒洒几万字,若无日记,怎么记住呢!

《大事记》能出版,已是奢侈之事,更详细的日记,恐怕再也没机会看到了。杨先生大限之前,对所有写给她的信件,凡涉及自己或他人隐私的、很亲密的信,大都进行了销毁;对未及处理的亲友来信,她委托遗嘱执行人,要在征得本人意见后,或退还本人或销毁或封存。(王海鸰《私人交往》)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,在烧毁别人来信的同时,她还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。吴学昭说,因为其中涉及自己和他人隐私,杨先生不想被小人利用拨弄是非。

以杨先生的笔法和习惯,其日记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都非常值得期待,如出版,必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大书,而现在只能给世人留下一个巨大的惊叹与惋惜。

对于商务印书馆愿意影印出版钱锺书的手稿,杨先生生前非常感激。她相信公之于世才是最妥善的保存,她祈愿这个办法能使“死者如生,生者无愧”。其实杨先生在有生之年,当时可以以更开放的心态,指导别人来整理出版她和钱先生的全部日记,无须删节,以还原一个更真实的钱锺书和真实的自我。但她不敢。她过于自爱了。她晚年在竭力为钱锺书和她自己塑造一种完美的形象,不容他人插手。她在近百岁之年,续写小说《洗澡》,撰成《洗澡之后》。去生前,她亲自审核删削,出版了所谓《杨绛全集》……

有人说杨先生“生前其实并未达到解脱的境界”,她处处维护钱锺书的声誉,对“钱学”研究划框框,“钱杨夫妇本质上是传统的知识分子,能洁身自好是其长,不能奋勇担当是其短。”(萧三匝《在杨绛忌日,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》)话虽言重,但也足以让人深思。杨先生又何尝不是在给自己“划框框”呢?